

★ 长城瞭望

# 捆住手脚怎能施展拳脚

——激活基层内生动力大家谈②

■程荣贵

跳舞,是戴着镣铐跳得好,还是不戴镣铐跳得好?答案很显然。所以,人们常用“戴着镣铐跳舞”,来形容那些无谓的束缚。激发基层内生动力,也是这个道理,也需要把那些捆绑官兵的手脚放开,让他们在基层这个舞台上尽显活力。

基层是部队建设的基础,广大官兵是部队建设的主人翁和生力军。“实现强军目标,基础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基层官兵的动力越大,强军兴军的力量就越大;基层官兵的活力越足,焕发出来的能量就越强。习主席强调“四个坚持扭住”,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调动基层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基层官兵投身部队建设的内在动力与活力。

放开手脚才能施展拳脚,捆住手脚只能限制发挥。现在,基层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个别单位对基层统得过死、抓得过细。该下级用的权,自己揽了;该下级决策的事,自己定了。有的信奉“用任务管部队”,左一个文件、右一个电话,打乱了基层的正常秩序。

这样做的结果,不利于调动官兵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发挥基层的主观能动性,甚至会出现“你不放心,我不用心;你不撒手,我就甩手;你要包揽,我就偷懒”的状况,形成推一推动一动、强调什么干什么的被动局面。

法规制度明确规定,基层有经费使用权、官兵奖惩评议权、工作安排权,以及官兵入党、考学、学技术、选训士官的提名推荐权,等等。这些本该是基层自己作主的事情,为什么被个别领导机关攥到手里了呢?原因无他:一是私心作怪,怕手中没了权力,就失了威信,说话不灵。二是缺乏信任,总觉得不给基层找点事,心里不踏实,就把各种活动安排得满满的,造成“上面乱忙,下面忙乱”。

放手,除了放权,还表现为信任。邓小平曾指出:“相互信任本身就是战斗力,是重要的战斗力。”相互信任,就是个人把自己放心地交给组织,组织放心地让同志们加油干。如果平时连工作安排的自主权都不放,连让基层行使

自主权的信任都没有,上了战场怎能放手让官兵打?一位连队主官谈到他的带兵体会时曾这样说:不仅要身体力行带着大伙儿一起干,还要敢于放手,不能一味“背”着战士往前走。放开手与背着走,哪个更有利于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战争,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大兵团的作战方式了,而呈现出小型化作战形态。有时,一个小分队、几个单兵,就可能主导战场态势。这对官兵临机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提出挑战。如果捆得太紧,什么都作不了主,事事请示汇报,战机就会稍纵即逝,甚至贻误战机、造成被动,何谈打赢?

活泼的部队能打仗。很难想像,平时被捆得死死的,甚至弄得战士连法定自由活动的时间都没有“自由”,上街要干部跟着,外出要骨干陪着,一旦战争爆发,或出现突发事件,怎能灵活处置情况、有效打击敌人?一位元帅回忆战争年代的部队管理时说,那时的红军部

队“到处一片欢腾”,民主气氛很浓,这样的部队才能打胜仗。如果呆板板的,那是一个打败仗的相,是打不好仗的。因此他要求“必须把活泼变成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管好不是“关住”,加强指导不能捆住手脚。基层自建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基层建设发展的质量。上级放心放手,下级才有尽心尽力的空间;上级放权还权,下级才有尽职尽责的余地。让基层拥有自主权,才能像陈云说的那样:“不仅自己会干,而且会推动别人干”“改变那种一人忙众人闲、上忙下闲的状况”。

改革力度越大,越要把基层搞坚强;改革越深入,越要使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权。放开手脚,授权放权,要像毛泽东总结的那样:“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当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作者单位:军委训练管理部)

内容更丰富  
下载更方便

欢迎关注“八一评论”微信公众号



★ 谈训论战

“抓练兵备战,既要防止以不打仗的心态抓准备打仗的事,也要防止以打仗的标准干与打仗无关的事。”一位领导同志说的这番话,切中时弊,值得警醒。

有人说,得标准者得天下。标准是一个人、一个单位从业创业的追求、尺度和准则。农民种田的标准是多打粮,使自己成为行家里手;工人做工的标准是出精品,使自己成为能工巧匠。与之相比,军人所从事的职业最为特殊,也最具风险,因为它关乎成败、关乎存亡、关乎生死。作为军队和军人的主业,能打胜仗也只能也必须是练兵打仗的最高标准,也只能是练兵打仗的唯一标准,任何凌驾于打仗标准之上或用其他标准代替打仗标准的行为都是十分危险的。

然而,不以打仗的标准去务打仗的活儿,或者把本该用在打仗上的标准用在干其他工作上,这种情况在过去某个时期并不少见。比如,有的对训练登记统计粗枝大叶,却对招待接待细致入微;对实战准备舍不得投入,却对迎检准备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战法研究不上心,却对领导讲话、工作汇报的语法修辞特别用心;对训练难度强度随意减免,却对消极保安全一刻也不放松。针对这种在标准上本末倒置的现象,有人说:他们要是像抓接待、抓检查、抓安全那样抓练兵备战就好了。

战争有权决定一切,战场有权审判一切。战争的残酷性就在于,任何夸夸其谈都会在它面前现出原形、暴露真相,任何有悖于战斗力建设的做法都会在它面前吃尽苦头。一些人之所以不把打仗标准当回事儿,之所以用打仗的标准干与打仗无关的事,盖因他们没有见到真正的“血”。吃了亏、流了血,就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标准应该坚持、什么标准必须舍弃。生死之地有真理。摔脑袋的事,怎容得乱来?

打仗的事必须用打仗的标准来干,与打仗无关的事绝不能用打仗的标准来要求。二者一旦错乱,打仗的事不但干不好,其他事必定干扰中心工作、冲击练兵备战,已经清除的各种积弊还会沉渣泛起,反过来影响谋划打仗的事。所以,我们不但不能用打仗的标准干与打仗无关的事,而且必须把那些与打仗无关的事彻底清除,以打仗的标准专心谋划打仗、钻打仗、练打仗。

和平时期抓练兵备战,是一项投入很大又容易分心走神的艰苦劳作。军队存在的全部理由是为打仗、打胜仗,而现实又是,战争离我们很近,我们离打赢还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作的目的和方向背离了打仗的标准,心思和精力偏离了打仗的准星,到头来必将付出血的代价。与打仗无关的标准定得越高,对部队练兵备战干扰就越大;与打仗无关的事干得越多,对战斗力的损害就越严重。

正所谓“你干过什么,战场最知道;你有什么优势短处,对手最清楚”。战争就是争输赢,打仗就是打准备。战场容不得儿戏,容不得战斗力标准偏移,容不得“从事于多务、他务、奇务”。我们不妨扪心自问:你专攻精练掌握的技能打仗管用吗?你精心谋划的活动打仗实用吗?你忙里忙外召开的会议打仗有用吗?

■张西成

## 不能用打仗标准干与打仗无关的事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某研究所)

## 『人的病』与『病的人』

■朱威明

★ 长城论坛

医生给人看病,既要看“人的病”,更要看“病的人”。中医看病,尤其这样。

我国国医大师王琦,就是一个重“病的人”的良医。他说:“我们行医,是看病的人,还是看人的病?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看人的病,丢掉了病后面的人,这是不行的。”他给人治病,始终把目光聚焦在人身,把对人的关心放在第一位。每次看完病,他都要告诉老百姓:你是什么体质,你如何管理身体,怎样才能达到少生病的目的。王琦的行医实践,对做好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很有启发。

如果说医生是看人身体上的疾病,那么,思想政治工作者就是医治人思想或心理上的病患。不论是医治身体上的病还是医治思想上的病,面对的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用来做实验的小白鼠。所以,治好人的病,首先要把人放在第一位,先把他看作一个人,再把他看作“病人”,给他们应有的人文关怀,这样才有利于治病救人,使他们恢复健康。如果一开始就认定他们是一个“病人”,戴着“病人”这样一个有色眼镜看他们,眼睛死盯着“病”字不放,看病只会用刀子、剪子,没有同情、没有感情,不但治不好病,还会加重病情,至少是不利于病人康复的。

思想工作是个技术活,更是个感情活。思想工作一旦“目中无人”,必然会在自己的工作对象面前形成一堵“无形的墙”: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我让你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做起工作来,也必然会像外科手术那样,只会“切”和“割”,使思想工作变为空洞的说教、严厉的训斥、简单的禁止。这样做工作,表面上可能“通”了,嘴上可能“服”了,实际上理不通,口服心不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政治工作没有自己单独的任务,其最终目的是为军事服务的。但它与打仗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不能用下命令的方式解决问题。攻山头、拔据点,命令一下,不容分说,只能向前冲,不能往后退。思想工作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它是一个情感交流的过程,靠下命令不但无济于事,而且会把事情弄坏。

现在跟过去相比,思想工作方法更多、手段更活。但一些单位思想工作的作用与效果不怎么好,过去没有听说过的事频繁发生。这除了工作对象的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经历阅历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外,与那种简单化的工作方式有很大关系。

一位著名医学专家说:“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思想工作也是这样。面对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只有既看“人的病”,更看“病的人”,有人的温度、人的感情,才会产生赴汤蹈火、生死相依的思想工作威力。(作者单位:66429部队)



鸡蛋发臭了,干菜发霉了,调料过期了……不久前,某部针对战备给养库里食品物品存放过久问题,对所属连队进行专项检查、集中整改,纠正战备物资特别是食材调料更换不及时等问题,并以此为例,对部队进行战备教育。

这正是:  
食品存放为战备,  
时间过长变了味。  
假如战争猝然临,  
敌手高兴我吃亏。

罗 园图 郑建坤文

★ 玉渊潭

## 识水性 见治功

■许志天

1852年,魏源通过对地形水势的分析,在《筹海篇》中作出预测:明清时期南向入淮的黄河河道,将会改道北流,由大清河(古济水)入海。他建议清政府因势利导,尽快实施人工改道北流,以免黄河自行行政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历史上对黄河改道预测最准的一次。3年后,黄河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自行改道北流了。魏源之所以能够作出如此准确的预测,缘于对黄河治理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他考察了历代治河人物如贾鲁、王景、潘季驯、新辅等人的得失,大胆推断:“审地势水性如之”“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

魏源不愧为清代著名的思想家,一个“审”字,便道出了数千年来治河的真谛。治水如此,干好其他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治河当知“河性”。不察地势水性,

必然会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尧派鲧治水,鲧采用“围堵障”的方法防御洪水,9年而未成,最后被放逐羽山而死。禹治水时,吸取了父亲鲧的教训,在“围堵障”的基础上,采取“疏顺导滞”的方法,“左准绳”以“望山川之形”,“右规矩”以“定高下之势”,用了13年时间才获成功。

黄河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难就难在不仅流域地形复杂,而且水土流失特别严重,“河水一石,其泥六斗,一岁所流,且不能敌一岁所淤”。历史上,黄河多次发生大改道,致河患不断,两岸生灵涂炭。在科技水平还很落后的古代,如何有效治理这样一条桀骜不驯的“泥河”,确实是对历代治官的严峻考验。

《后汉书》记载,东汉王景治河时,“高度地势,凿山阜,破砥柱,直截沟涧,防遏要冲,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

门,令更相洄注。”由于实施分水分沙体系,效果显著,其后千年没有发生一次重大的黄河改道,出现了黄河历史上少有的相对安定时期,创造了治黄史上的一个传奇。

不过魏源却认为,“王景治河、安流千年”,固然是“禹后一大治”,但这并不能说明王景就有什么特别超凡的能耐。说到底,不过是顺应了地势水性而已。后世治官,不是才能不及王景,也不是不懂地势水性,“其弊在于以河通漕,故不暇以河治河也”。目的不绝,自然就难以专一而事功。

在古代,治河和漕运,历来是两难选择。河患不治,殃及沿岸百姓;而漕运不通,危及京城物资供应。这就需要治官立足全局,善于从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区分轻重缓急,找到一个兼顾各类矛盾的治理方案。可以说,如何妥善处理治河与漕运的矛盾,统筹

兼顾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不仅需要治官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更需要其具备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勇敢的担当精神。所以“审地势水性”,更重要的是“审”政治全局上的“地势水性”,全面衡量,综合考察,这样才能作出科学的决策。

清朝新辅的治水水平不在王景之下,先期在治河上也大获成功。当康熙有意先整治下河工程以保漕运时,一些惯于见风使舵的人曲意逢迎,而生性耿直的新辅却敢于从实际出发、大胆建言,认为“下河河道低于海平面五尺,疏浚海口不但不能泄水入海,反会潮水内灌,造成更严重的灾害”,建议即使是要整治下河口,也不应该采用挖的方式,而是应在下河两岸筑长堤束水以冲刷河槽,并抵御海潮入侵。但是他的正确主张,却受到一些居心叵测之徒的诽谤发难,新辅遭受革职处分的不公平待遇。后来的事实证明,还是新辅“于河务最为谙练”,康熙重新起用新辅为河道总督,并在其死后建专祠纪念,大力褒扬“其利益在国家,德泽在生民”的治河功绩。

一部治黄史,也是一部治政史。政清则黄河治,吏明则德泽生。历代治官在留下治黄工程时,也留下了为官从政的一道道碑文。有的读来让人荡气回肠,有的读来让人唏嘘叹息。治政如治水,公与私、疏与堵、智与愚、勤与懒,都写在巍然高耸的堤坝上了。“不审势则宽严皆误”,既是对领导者的提醒,也是对所有管理者的忠告。